

乐为作者当“园丁”

□丁一

在迎来《烟台日报》创刊8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回忆起40多年前在报社干编辑的美好时光，不由得心潮涌动，感慨颇多！

我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从企业调到《烟台日报》的。当时，《烟台日报》是由原来的《烟台劳动报》演变而来的。因为要改办日报，所以从四面八方调进了一批新人干记者。当时我对此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调到众人仰慕的单位来工作，忧的是自己是个高生，文化底蕴太浅，不是干新闻工作的料。可是，当我想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要“敢想、敢说、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时，胆子便大了起来，恰似“初生牛犊不怕虎”，很快便冲到采访的前线，昼夜忙个不停！在一连失败几次以后，我认识到，要想好这一步，实在太难了。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当起“小学生”，恭恭敬敬地拜能者为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采编经验，请教自己不懂的问题。大约过了大半年，我在多位贵人的帮助下，懂得了写消息和通讯的一般知识，掌握了写作方面的基本要领。此时，我的信心大增，下决心要实现自己干好记者、编辑的梦想！我的好学上进、敢于打拼的表现，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认可，工作也由以采访为主转为以编辑为主。就这样，我先后在地、市两级多家报社干编辑，一干便是23年，直至1981年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所热爱的岗位。

实践使我体会到，作者是报纸这个“百花园”里的主人，编辑是“园丁”，是为作者们服务的。编辑，在我国素有“为别人作嫁衣裳”的比喻，形容为别人忙碌。我把这个比喻与“园丁”联系在一起，摆正了自己与作者们的位置。经过20多年的编辑工作，我尝到了干这一行的乐趣，主要有三点：一是编辑工作适合我的性格，它可以使我心无旁骛地在安静的环境里“爬格子”。二是能够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作者，通过常来常往，我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有些成了我的朋友或老师。三是我编辑的稿件见报后，被读者认可甚至受到赞赏时，我会成就感，觉得脸上有光。由于以上原因，我对给作者当“园丁”这件事感到特别荣幸！

在我看来，编辑并不是想当就能当好的，因为它需要付出艰辛而细致的劳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报社的编采人员很少，因此十分重视依靠群众办报。然而，当时的通讯员的来稿比较少，常常是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必须克服各种困难，加强与通讯员的合作。当时编辑室没有条件安装电话，我们与通讯员和其他作者主要靠面对面交谈，有时我还会亲自跑去找他们，甚至到他们的家中约稿。特别是遇到急需的稿件时，我常常用十分恳切的口吻去央求人家写稿。有时对方因为本职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为我写稿，但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和再三恳求，最终想方设法把稿子写好给我。每逢接到这种“雪中送炭”的稿件时，我的心情总是很激动的，因为他们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还有一种情况也令我很感动，那就是在过年过节人们都休假的时候，我去找通讯员约稿子，他们从不拒绝。他们宁肯牺牲休息时间，也要及时把稿件写好。1959年春节，我们要编发一篇“节日坚持生产”的稿子，我马上想到了发电厂的戚本盛同志。当时我与他并不相识，只是看到他常为报社写稿，便想请他写一篇电厂职工节日坚持生产的稿子。他二话没说便痛快地答应下来，按照我的意图把稿子写好给了我。我常这样想：这些骨干通讯员就像部队的战士一样，真正做到了召之即来、来则能战、战则必胜！报社有这么一支通讯员队伍，还愁报纸办不好吗？

我认为，一个能被作者信任的编辑，就应当像园丁对待花草那样，爱护每一个作者和通讯员，常为他们“浇水、施肥、剪枝、除草”，精心培育他们茁壮成长。从日常来稿能够看出，有的通讯员很有写稿的热情，但由于缺乏写作知识，稿子的采用率并不高，有的甚至写了几十篇稿件，都因不合格而不能见报。针对这种情况，我对写稿有热情而又培养前途的通讯员伸出了温暖之手，采用不同方法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保护他们写稿的积极性。有时我会当面给他们指出某一稿件不能采用的原因，告诉他们应当写什么稿和怎样写稿；有的作者离报社较远，与其当面交谈有困难，我就写信指出其稿件存在的问题，告诉他们改进写的方法，指出其努力的方向，这样做的效果都比较好。特别是一些工农通讯员，经过具体指导以后，其写作能力均有所提高。啤酒厂工人李华建，造锁厂工人王士旭、皮革厂工人毛贤君等，因为住的离我家很近，有时会把写好的稿子送到我家，当面征求我的意见；有时他们会先找我谈谈看法，然后再动笔写稿，这样对他们的写作都有所帮助。

要做作者信任的编辑，就要有读者意识。要让群众喜欢看你办的报纸，就要追求报纸的高质量。报社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报社又好像是饭店，顾

客来自四面八方，口味各不相同。要满足顾客的不同需要，就要把饭菜做得既货真价实，又色、香、味俱全。要想让每一期报纸出版后，读者拿到手上总想多看几遍，编辑就必须在众多的来稿中多中选好、好中选优。谁的稿件质量好，就选用谁的稿件，不滥用“关系稿”，不编用“失时稿”。只有这样，才能正确使用手中的“生、杀、予、夺”之权，才能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作者和读者。

在做编辑工作的漫长岁月里，我对经手编辑的几百万字的稿件，总能做到耐心认真、精雕细刻，力求把稿子编得简洁明快。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写作的条件与现在是没法比的。现在不少作者写稿时用的是电脑，字迹工整清晰，便于阅读。我干编辑的时候，接到的来稿可谓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纸张上看，有的是稿纸，有的是信笺，有的用废旧纸，还有的是用香烟盒甚至火柴包装纸或旧信封的背面写稿。来稿有的是用钢笔写的，有的是用圆珠笔写的，还有的是用铅笔写的。有的字迹清楚、结构严谨、文笔流畅；有的则潦潦草草、东拉西扯；还有的语法不通、缺乏逻辑性……为了把内容好但文笔太差的稿子改好，我只得另起“炉灶”，打乱原稿的结构，重新写作，有时要用一个多小时才能改写完一篇千八百字的稿子。有的同事认为费这么大的工夫去改一篇稿子没有必要，我却不一样。我认为，改一篇有大病的稿子，就好比大夫救治一个危重病人那样，既要讲医术，也要讲医德。我把一篇有“重病”的稿子改成了可用的好稿子，不正像大夫为危重病人开了刀，使其获得了新生一样吗？我并不求作者感谢我，求的是自己尽到了一个编辑的责任，虽然辛苦了一点，但是很值得！稿子见报以后，不光作者高兴，我也觉得欣慰！

我为作者当“园丁”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最初阶段，我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当时，与我一起进报社的同仁中，有几位因为经受不住磨炼，很快便打了“退堂鼓”，但我从未动摇过对新闻工作的信心和勇气。当时我编写的稿子多次被总编“枪毙”，在外面采访时多次“碰壁”，甚至被有的领导白眼冷对、严词责备过，我并未气馁。我知错必改，不怕挫折。“三年困难时期”，我陷入了父残、妻病、子幼和工资收入低的生活困境，在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我也不曾沮丧，没低头说过熊话，始终初心不变、矢志不移！我坚信，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谁无暴风劲雨时”，只要坚持埋头苦干，就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对工作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念，还要归功于我有幸遇到的恩人、启蒙老师、副总编辑于德同志。他自强不息的成长历程，对我很有激励作用。于德同志只念过4年书，14岁开始在《大众报》当捡字工，通过勤学苦练，自学成才，最后成了副总编辑。他几乎掌握了所有文体的写作技能，写消息、通讯和评论，更是他的拿手活。当时，他说我干记者“带架”，便特意用心栽培我，多次带我到农村或工厂采访。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他第一次教我写通讯。当时，大办人民公社之风刚刚兴起，于德同志带我到西郊幸福村采访。为了感受到群众对公社的热情，我们提前一天住进了幸福村。第二天庆祝大会结束后，他要我写一篇通讯。此前我从未写过通讯，只能硬着头皮、花了几个小时写了一篇七八百字的稿子交给了他。晚上，他突然派人到宿舍，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进屋后，他很和善地让我坐在他的身旁，把我写的稿子摆在桌上，然后一字字、一句句地挑问题，告诉我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写和应怎样写。他每讲完一页，便在稿纸上打一个红“×”。他看了看表，对我说：“时间不早了，按计划这篇通讯要在明日见报，恐怕你还没有掌握写作要领，干脆由我来写，你回去休息吧。”回宿舍的路上，我不停地回忆着于德同志为我指点迷津的一幕幕，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后来，我又跟于德同志外出采访过几次，他仍然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他不仅是我学习写作的指路人，也是我为人处事的好榜样。我决心跟在他的后面，努力前行，争取做像他一样的记者和编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顽强拼搏，我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先后干过记者、编辑、编辑组长、主任和副总编辑。我不仅能写作和编辑消息、通讯类的新闻作品，还能写些评论性的文章。我还以《怎样写消息》《新闻记者的常用武器》等为题举办过讲座，与同仁们交流经验。曾有人问我有何秘诀？我说我没有什么秘诀，有的只是四个字“自强不息”。人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的话，我还甘愿做“园丁”，因为我太热爱这个职业了！

《烟台日报》是我进步的阶梯、成长的摇篮。它对我恩深义重，我此生难忘！在迎来她80岁喜寿时，我衷心祝愿她青春常在、前程似锦！



四十年相伴的隽永时光

□郭新章

活动既扩大了《烟台晚报》的影响力，也提升了烟台啤酒的品牌形象，加强了报社合作关系。

初次参与日报活动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烟台日报》开辟了《经济广角》栏目，责任编辑赛波先生经常邀请烟台知名企业以及进入烟台市场的外地知名品牌召开座谈会和交流会。《经济广角》是烟台经济工作的宣传阵地，也是企业交流的平台，形成了报社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也体现了报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理念。我作为“营销人”，也在被邀之列。通过这一平台，我先后发表了《区域品牌生存发展之道》《以差异化塑造企业竞争优势》等文章，宣传了烟台啤酒品牌形象，坚定了烟台啤酒人的信心。

初次在工厂举办读者颁奖活动

《今晨6点》创刊后，为扩大影响力，报社开展读报有奖活动，我们公司请相关管理人员来工厂参加颁奖仪式。宽敞明亮的会议室、卫生整洁的员工食堂，给活动提供了便利。100多位参加者参观了烟台啤酒博物馆，领略了百年啤酒文化，参观了啤酒工业流水线，了解了啤酒的生产工艺与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大部分读者是首次来到啤酒企业，得到了意外的收获。这次活动，体现了烟台日报社对读者的关心和重视，同时也宣传了烟台啤酒的企业形象，提升了企业的美誉度。

初次与小报童合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与竞争的加剧，报纸发行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烟台日报社审时度势，成立了“小报童”发行公司，把报纸杂志送到读者家门口。遍布大街小巷的报亭、售报亭、售报车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不正是烟台啤酒深入千家万户的载体吗？我们与当时的“小报童”经理周世文先生协商，谋求合作共赢。我们承担部分报亭的制作费用，在报亭正面贴上烟台啤酒的产品广告与信息，在报亭旁设立了啤酒售卖点。那些年，职工下班后买上一份报纸、打上一袋鲜啤，精神营养与啤酒美味共享，成为一种时尚。

初次被总编辑约见

《华夏酒报》整合到烟台日报社后曾

停刊了几年，但刊号还在。随着形势的发展，《华夏酒报》复刊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时任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郑强先生邀请我到报社协商。来到郑总办公室，笑容可掬的郑总从长方形的办公桌旁站起来，热情地与我握手，瞬间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他询问了烟台啤酒的生产经营情况，并感谢企业长期以来对报社的支持，对烟台啤酒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望。我向郑总汇报了中国酒类行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我几十年的从业经历表达了对酒报复刊的迫切愿望，并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大半个下午，我在滔滔不绝地讲，郑总在用心倾听，我们的交流在热烈风趣的气氛中结束。

《华夏酒报》复刊后实现了战略转型，我见证了它从北大街54号进军首都市北京的过程，见证了它从单一服务酒类企业到面向酒类经销商、酒类消费者的全产业链全方位的覆盖，见证了它从一张报纸到一个综合服务平台的华丽转身，见证了它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媒介升级。在《华夏酒报》创刊35周年之际，面对记者的采访，我激动地说：“35年风雨兼程创新发展，35年砥砺前行硕果累累，‘华夏’代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酒报’代表国民经济举足轻重的酒类行业之权威性和公信力，衷心祝愿《华夏酒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创辉煌。”

初次主动赞助报社活动

2015年是《烟台日报》创刊70周年。这是烟台报业的一件盛事，也是烟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作为长期与报社合作的企业，我拜访了时任报社总编辑的戴志东先生，汇报了我们企业有意赞助《烟台日报》创刊70周年活动的想法。作为回馈，报社在宣传《烟台日报》创刊70周年时，开展了烟台啤酒95周年的品牌宣传活动。

创刊以来，《烟台日报》作为烟台市委机关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社情民意。烟台啤酒历经风雨，创新发展，把欢快酿进杯中，让生活品位更高，用心酿好酒，承担社会责任。

40年青春年华，40年风雨兼程。《烟台日报》创刊80年，我与之相伴40年，邂逅了无数个“初次”，这是历史的机遇，更是人生之缘分，弥足珍贵。

酒香墨香，伴我成长；报业辉煌，举杯共享！

灯塔照耀我前行

□孙明浩

40多年前，当一篇稚嫩的“豆腐块”在《烟台日报》的版面上占据方寸之地时，我未曾想到，这铅字间的温度会贯穿一生。

从栖霞县药材公司仓库里伏案夜读的青年，到捧得山东省政府社会科学一等奖的研究者；从每月省下工资买书的自学者，到被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点赞的“时代人物”，我的人生轨迹始终与这份报纸紧密交织。《烟台日报》于我而言，不仅是记录成长的记事本，更是照亮我前行的精神灯塔，见证着一个基层干部用笔墨与汗水书写的奋斗篇章，也折射出一座城市对知识、文化与奋斗者的深情礼赞。

1982年7月，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栖霞县药材公司工作。白天，我在仓库里清理账目、核查药材进出库清单，夜晚则伏在昏黄的台灯下与文字为伴。那时，单位订的《烟台日报》成了我每天必读的“功课”。油墨的清香从报纸上弥散开来，仿佛为我推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昏暗的灯光下，报纸上的铅字像星星一样闪烁。”我至今记得，正是通过这份报纸，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新闻写作的逻辑，了解了烟台各地的发展故事，也找到了表达自我的渠道。我开始尝试写稿、投稿，那些发表在报纸上的“豆腐块”，成了我人生进阶的第一块基石。

随着见报稿件的增多，我也逐渐被上级部门认可，不久后便被调入市直机关。身份变了，但我与《烟台日报》的缘分愈发深厚——我成了《烟台日报》的通讯员，笔下的视野也从仓库转向更广阔的社会。《为了绿满荒山》《孙宝民的“四季歌”》等几十篇典型人物报道经过我的笔陆续见报，其中《孙宝民的“四季歌”》还斩获了《烟台日报》征文奖。这些作品让我深刻体会到：文字不只是记录，更能传递力量。

灯塔指引方向。后来，我的写作逐渐朝社科理论转向。我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关注社会发展，探讨现实问题，一篇篇理论文章开始出现在《烟台日报》及各类学术报刊上，我自己也悄然成为报纸镜头下被“关注的人物”。1992年5月29日，《烟台日报》以《宝剑锋从砥砺出》为题，专题报道了我的自学成才事迹，揭示了“十年磨一剑”背后的坚韧。这篇报道不仅是一个自学者的记录，更在无形中构建了一套价值坐标——“知识改变命运”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扎根乡土的真实叙事。一年后，《中国工人》杂志在“时代人物”专栏写道：“孙明浩十年苦读，笔耕不辍，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作品200多篇，多次获省市社科成果奖。他虽未成就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却在自己一方天地里实现了价值。”这样的评价，与《烟台日报》的报道遥相呼应，更坚定了我“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的信念。此后，我先后发表了5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20多项成果被《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文摘》等权威期刊转载，斩获省、部、市级奖项无数——其中，获国家人事部科研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两项成果被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参阅，三项成果分别获得山东省政府社科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这些成绩的背后，始终有《烟台日报》领导和编辑的关注和提携：如1994年《围墙被拆除之后》、1995年《追逐大地之光》、1996年“烟台十佳藏书家庭”专访……《烟台日报》用一篇篇报道，记录下了我从“习作者”到“研究者”的发展轨迹。

步入新世纪，我转向了更深层的文化维度——栖霞乃至烟台的地域文化研究。此后十余年，我埋首故纸堆与田野间，先后出版了《胶东风流》《跨世纪的思

索》《栖霞风物》《古风撷英》等作品，累计达400余万字。《烟台日报》始终如我人生旅途上的灯塔，总在我人生的关键转折处给予我温暖。2005年，《烟台日报》等媒体先后刊发书评，对我的《栖霞风物》《神仙丘处机》等专集予以肯定。安家正教授在《烟台日报》撰文称《神仙丘处机》“是地域文化的丰碑”。

从最初的“豆腐块”到如今的专著评论，从仓库保管员到地域文化研究者，我站在花甲之年的门槛回望，遇上《烟台日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际遇之一。它对我人生的意义独特而深刻，无可替代。当然，这里的遇上，并不是简单地看到或触及，而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它达成关联或者说叫“缘分”。这种缘分，是40年的一路相伴，一路呵护；这份情感，像一位相知多年的师长和挚友，见证了我人生的诸多重要时刻，陪伴我在无尽的思索与深沉的感悟中，从山重水复走向柳暗花明。对我而言，它不仅仅是一张报纸，更是点燃一个青年梦想的火种，是我人生旅程中熠熠生辉的星辰，照亮了我阅读与成长的道路。

如今，我退而不休，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活动，配合著名作家衣向东成立了栖霞市霞光文学社，并参与栖霞市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为栖霞的文化文学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余热。

与《烟台日报》相伴的40年，是一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份报纸与一座城市、一代奋斗者精神共鸣的生动注脚。而那些尚未写就的故事，仍将沿着报纸的纹路生长，如同胶东大地生生不息的文脉，永远向着光明延伸。

(孙明浩，栖霞市退休干部。曾获得“烟台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十大优秀自学者标兵”“全国自学成才者”“全国优秀新闻文化工作者”等荣誉称号)